

# 全球发展倡议视角下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影响力提升的机遇、挑战与策略研究

陆海林<sup>1</sup>, 刘建<sup>2</sup>

(1. 南通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2. 深圳大学 体育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以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为现实背景提出的重大倡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 国际体育援助的总体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格局之变、理念之变和需求生变为中国进一步提升体育对外援助的影响力带来机遇的同时, 也存在体育援助领域话语权处于相对弱势、参与主体较为单一和体育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强等诸多挑战。研究认为, 中国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切入点, 从明确战略目标、推动结构改革和创新方式方法等方面, 着力构建新时代体育对外援助体系, 提升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影响力。

**【关键词】**全球发展倡议; 体育对外援助; 体育外交; 国际体育影响力; 体育事业

**【中图分类号】**G812.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3)03-0108-09

**DOI:** 10.15877/j.cnki.nsic.20230602.002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sup>[1]</sup>“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指出“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体育对外交往格局”“为全球体育治理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是体育对外交往的目标之一<sup>[2]</sup>。体育对外援助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组成部分, 促进中华民族与世界民众的友好交流, 推动国内资源与国外市场的长效沟通<sup>[3]</sup>, 是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目前, 关于体育对外援助的研究成果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 以时空发展为主线, 呈现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史实脉络, 侧重于回顾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开启动因与发展历程等; 另一类, 则是将体育对外援助视作体育对外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 侧重于探讨体育对外援助之于提升我国国际体育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工具性价值。2021年9月21日, 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 该倡议不仅为国际社会发展合作提供了公共产品与合作平台, 也为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在国际体育促进发展领域和中国对外援

助体系的双重变局下, 结合全球发展倡议研究如何提升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影响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 1 全球发展倡议与体育对外援助的内在联系

### 1.1 全球发展倡议的基本内涵

面对国际发展合作进程所遭受到的严峻挑战, 习近平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以“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坚持行动导向”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发展倡议。该倡议对于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和联通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 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 为破解发展赤字提供了可行路径。自提出以来, 全球发展倡议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

收稿日期: 2023-03-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2BTY023)。

第一作者: 陆海林(1982—), 男, 江苏东海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国际体育政治。

通信作者: 刘建(1972—), 男, 辽宁凌源人,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 体育管理学。

和参与,倡议不仅被写入中国同东盟、中亚、非洲、拉美、太平洋岛国等合作文件,还有100多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加入由中国在联合国发起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sup>[4]</sup>。另一方面,全球发展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由理念转化为实践的重要平台,为中国更好参与全球发展合作提供了方向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通过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一个更长时间和更广维度上繁荣稳定的国际社会。全球发展倡议则将议题聚焦于国际发展合作领域,通过让世界各国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和红利,从而实现共同发展。

## 1.2 全球发展倡议与体育对外援助互动的基本逻辑

全球发展倡议作为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实践的总体性理念,无论从发展合作内容上,还是从发展合作形式上都为各个行业、部门提供了指导性方案。在全球发展倡议视角下讨论体育对外援助影响力的提升,既有体育对外援助历程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中国为全球体育治理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的现实逻辑;既有倡议理念向实际行动转化的理论逻辑,也有中国更好参与国际体育促进发展议程的实践逻辑。

第一,全球发展倡议对于提升体育对外援助影响力的历史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进入整体性规划阶段,援助理念由“无偿援助”向“发展合作”转变越发清晰。就国务院关于对外援助机构设置的动向而言,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于2018年成立。从相关法规和文件表述看,在2021年1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以及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新的《对外援助管理办法》中,都已将“援助”改述为“发展合作”。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理念和方式也应由“无偿主导、合作辅助”型逐步向“合作主导、无偿辅助”型转换,以适应新时代体育对外交往的新需求。

第二,全球发展倡议对于提升体育对外援助影响力的现实逻辑。信息平台 and 资金保障是体育对外援助项目顺利实施的充分条件。南南发展与合作学院、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以及由中国发起成立的“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等多个平台,为体育对外援助更好地开展提供了丰实的信息渠道。同时,为

了推动发展议程,中国还设立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等多个发展基金,基金类型和规模的扩大为体育对外援助项目实施提供了较好的资金保障。

第三,体育对外援助对于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理论逻辑。倡议本意为“倡导”“首倡”,意指首先提出建议或行动方案,将倡议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才符合倡议的目的和倡导者的诉求。全球发展倡议同样符合基本规律和经验,需要各个行业、部门将之转化为可操作的实际行动。体育对外援助作为对外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功能各异。在援助形式上,既有像援建体育基础设施这样的硬援助,也包括体育人力资源培养在内的软援助。在功能方面,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促进受援地社会民生发展,也能帮助受援地实现经济发展。所以,提升体育对外援助的影响力有助于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

第四,体育对外援助之于推进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实践逻辑。体育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能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sup>[5]</sup>。体育对外援助不仅有助于凝聚国际发展合作共识,为倡议的具体化操作提供政治共识。一方面,中国式体育现代化蕴含的鲜明特色和内在逻辑是对体育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据自身特色发展体育事业提供了全新选择<sup>[6]</sup>。另一方面,体育对外援助被认为是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彰显中国担当的重要举措<sup>[7]</sup>,为扩大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淀必要的社会资本。

## 2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影响力提升的机遇

### 2.1 格局转变: 增强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可见性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西方发达国家是体育对外援助的主要参与者和供资方,援助资金规模占据全球的绝对比重。但是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东升西降”为特征的国际体育援助格局愈发凸显。

一方面,表现为国际体育援助参与主体更加丰富,包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国家正在经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身份转变,为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新兴援助国援助资金规模的相对上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迟滞且短期难以恢复活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体育援助的物质资源持续收窄。据经济发展合作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2019年,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的援助净支出为1535亿美元,占其国民总收入的0.29%,不仅远低于其承诺的占国民总收入0.7%的目标,而且相较于2018年减少了1.16%,体育领域的占比也呈下降态势<sup>[8]</sup>。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对外援助资金比重持续上升,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sup>[9]</sup>。就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实践而言,无论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对落后的新中国成立之时,还是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日,都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体育事业发展诉求,为发展中国家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据《中国对外援助》(2011版、2014版)和《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披露,中国为加蓬援建的可容纳4万人的体育场,2012年成功承办了第二十八届非洲杯足球赛决赛和闭幕式;为格林纳达、几内亚比绍、突尼斯等国建设、维修和升级改造体育运动场馆;为缅甸第二十七届东南亚运动会、赞比亚独立50周年庆典团体操、刚果(布)第十一届非洲运动会开闭幕式团体操演出等大型文体活动提供技术培训,协助组织开闭幕式。萨马兰奇在评价中国对非洲各国体育的贡献时曾说,中国建设的最好体育场馆不在中国,而在非洲,他认为中国是第三世界的榜样<sup>[10]</sup>。

在全球发展倡议的引领下,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体育援助能力与意愿逐步提升,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在国际体育援助新格局中的可见性愈发明显。正如习近平在2022年11月出席G20峰会时强调:“我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着眼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sup>[11]</sup>

## 2.2 理念比较:凸显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合理性

“理念”浓缩了一项倡议或议程的基本价值取向,对实践方向和目标往往起决定性作用<sup>[12]</sup>。发达国家基于“国家利益”“人道关怀”“社会交换”等论调开展对外援助,在此背景下实施的援助项目天然地具有不平等性。

在体育援助领域中,西方发达国家坚持西方社会的“先进性”,不仅以“教师爷”自居,还通过附加

条件的援助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出发展体育事业的“现代化”处方,试图逼迫受援国接受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受援国想要从西方国家获取体育援助资源,不仅要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念,还要以一定的物质资源作为交换条件。这种构建于不平等关系之上的援助理念不仅未能提升援助有效性,实现受援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还造成了援助双方资源单向流动的不均衡性。日本在南苏丹实施的“以体育促和平”技术合作项目(2019—2023)就是典型案例。日本与南苏丹地方政府、体育支援团体和国际机构建立合作机制,举办社区以及全国性体育活动,以增进当地社会的包容性,但是背后却是为了确保日本战略资源供给、强化经济安全保障等目的<sup>[13]</sup>。美国提供体育对外援助的核心目标不是促进受援国体育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不是基于受援国的需求,而是将全球健康和人道主义援助视为维持其全球领导力的重要手段<sup>[14]</sup>。

中国对外援助始终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的援助理念,坚决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体育援助时,坚持“普惠包容”“人民为中心”的原则,关注受援国的援助需求,充分考量国家间和各国家内部体育事业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和实施体育对外援助项目、在平等合作中促进受援地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

## 2.3 需求生变:提升了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有效性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步入快车道,传统受援国已不是一个同质的、落后的群体,部分南方国家获得国际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移的宝贵机遇期,实现了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化制造业经济的转型<sup>[15]</sup>。

首先,部分南方国家将逐步摆脱贫困,自主发展意识不断增强,通过对外合作、合理利用援助促进本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愿望也十分强烈。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9.7%、全球贸易增长1.7%~6.2%、全球收入增加0.7%~2.9%<sup>[16]</sup>。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国民收入也将步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成套援助项目的实施在促进受援地经济社会发



展的同时,也为当地居民增加收入提供了机遇。在中国援助瓦努阿图的塔纳岛公路项目中,前两期工程共聘用了400余名当地工人,这些工人不仅学到了各种筑路技术,月薪也涨到13万瓦图(约合8000元人民币)<sup>[17]</sup>。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引发全民健身、体育产业等领域的需求,完善国家体育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由于不具备实现自主转型的能力,因而需要依靠政策或外部帮助实现本国体育事业发展。

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坚持行动导向,促进国际发展知识的交流与互鉴是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目标之一<sup>[18]</sup>。基于西方发展经验的体育援助项目往往忽视具有差异性的发展背景,也未能给予受援地充分的承认与尊重,常常导致援助有效性不足等窘境,甚至西方内部也发出了“援助无效”“援助死亡”的质疑<sup>[19]</sup>。与传统悬置性发展知识不同,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实践者是具有体育竞技训练、体育系统管理等方面的专家,如曾被授予“阿兹特克——雄鹰”勋章的跳水教练马进,将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分享给墨西哥教练团队,并带领墨西哥国家跳水队获得240余枚奖牌<sup>[20]</sup>。

### 3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影响力提升的挑战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实践与西方国家是同步发展的,在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体育事业发展诉求,为发展中国家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和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提供力所能及帮助的同时,也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提升体育对外援助影响力仍面临体育援助领域话语权处于相对弱势、参与主体较为单一和体育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强等诸多挑战。

#### 3.1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话语权亟待提升

目前,关于体育促进发展的相关理论,大多是基于西方经验、西方概念以西方叙事方式展开的,通过对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产生出一整套非西方世界发展的理论体系,并将这种理论实践化和制度化,由此形成体育促进发展领域的知识霸权,导致受援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体育援助项目产生认知偏差,在相关问题的论辩过程中时常陷入西方话语的陷阱,在西方体育援助理论中被视为一个“他者”。

一方面,西方国家完全无视中国在促进亚非拉

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中所做出的贡献,而是运用“新殖民主义论”“资源掠夺论”等话语抹黑、诋毁中国对亚非拉国家的体育援助,炮制莫须有的“体育馆外交”叙事,刻意放大国际体育促进发展领域中外理念之间的对立<sup>[21]</sup>。另一方面,虽然在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后,中国以夯实体育综合实力为主线,迅速融入既有国际体育秩序,并通过体育对外援助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等和中国具有相似情景的国家发展体育事业提供了独特的经验,但目前尚未形成一整套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体育对外援助自主知识体系。

#### 3.2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参与主体亟需丰富

我国目前体育对外援助的参与主体相对单一。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负责开展国际间的体育合作与交流工作,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体育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负责援派教练、体育技术合作等,中国体育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主营承建国内外体育设施工程,对外派遣工程和体育服务行业的劳务人员等,此外,各运动项目中心和部分省市承担来华训练或知识培训等项目<sup>[22]</sup>。

而传统援助国为了达成体育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积极构建以官民并举,政企合作的多元化格局,即政府机构作为体育援助项目开展的主要责任者,积极引导包括体育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积极参与,同时动员高等院校、跨国企业和私人基金会等其他利益攸关者,作为项目实施的重要补充,以实现多元参与主体下人、财、物的相互协调配合。如在日本的“体育为明天”项目组织结构中,日本外务省和体育厅作为项目实施的主要领导机构,负责总体战略和宏观政策的制定。日本国际协力机构、体育委员会、奥林匹克委员会、残奥委员会、地方政府和高等院校等413个机构,依据各自的宗旨,负责具体援助项目的策划与执行。在供资方面,日本政府和国际交流基金是援助项目实施资金的主要提供者,跨国企业和私人基金会等其他利益相关方作为重要补充,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资金帮助与技术支持。再如澳大利亚体育对外援助项目实施的主要机构和供资者是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与澳大利亚体育运动委员会,各体育单项协会和研究机构在内的体育组织作为援助项目的执行主体,体育外交顾问委员会则作为协调机构,负责援助项目实施的

监测与评估<sup>[23]</sup>。

### 3.3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任重道远

在我国以往的对外援助实践中,体育援助是国家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常作为经济援助的一个方面,服务于政治友好与经济合作<sup>[24]</sup>,其特征表现为以援建体育基础设施的“硬援助”为主。据不完全统计,仅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以来,新设援非体育场馆遍及非洲40多个国家,较大规模场馆80多个,总座位数约300万个<sup>[25]</sup>,对促进受援国公共体育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设施维护与保养条件,部分援建体育基础实施一度失去场馆功能,而中国不得不进行二次援助,对援建场馆进行维修改造。如我国先后启动了对突尼斯青年文化体育中心升级改造、援尼泊尔达沙拉斯体育场维修、援桑给巴尔阿玛尼体育场维修、援乌干达体育场体育设备维修等项目,以保证援建体育场馆设施的正常功能。

尽管近些年我国加大了对“软援助”的支持力度,援外人力资源开发项目规模在总体援建规模中占比快速提升<sup>[26]</sup>,但也仅限于如龙舟、武术、射箭等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而较少考虑受援地体育项目分布的本土化特征,导致体育对外援助中的“软援助”受众规模小、可持续性不强,极大制约了体育对外援助项目效力的发挥。

## 4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影响力提升的策略

通过近70年的参与实践,中国虽已积累了一定的援助经验,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体系<sup>[27]</sup>,但在国际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理念急速变革和我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体制机制改革的背景下,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切入点,从明确战略目标、推动结构改革和创新方式方法等方面,着力构建新时代体育对外援助体系,提升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影响力。

### 4.1 战略层面:明确体育对外援助的战略目标

新时代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必须依据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坚持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总原则下<sup>[28]</sup>,紧密围绕实现体育强国战略目标和服务国家总体对外战略为根本宗旨,制定符合国情的体育对外援助多层次战略目标,实现体育对外援助影响力的提升。

#### 4.1.1 体育对外援助作为促进受援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助推剂”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应贯彻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体育事业发展作为优先战略目标,让援助成为促进受援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助推剂”。体育对外援助最根本的目的是促进受援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此外,也应注重体育援助项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中介效应,实现受援国非体育领域的其他社会发展目标。一方面,中国应加大对发展中国家体育基础设施的支持,以弥补传统援助国供给不足的资金缺口,改善受援国体育基础设施相对匮乏的现状。另一方面,应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发展中国家分享体育事业发展经验,支持与帮助发展中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从而让受援国人民能切实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 4.1.2 体育对外援助作为增进国家间民众感情交流的“民心桥”

体育对外援助作为我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充分发挥体育对外援助在“汇聚民心、融合文化”方面的优势,通过体育援助项目的实施,增进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民众感情的纽带,为实现国家之间合作共赢架起民心相容的桥梁。良性的公共外交是一个从相互了解开始,最终实现共赢的周期性流程。相互了解是基础条件,培养感情是前提,相互合作是方式,双方共赢是最终目的<sup>[29]</sup>。正如习近平所言:“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sup>[30]</sup>

体育对外援助运作灵活、实时高效,在“汇聚民心、融合文化”方面具有较强的张力。当前,由我国作为主要发起者和参与者的众多区域合作机制,如“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太合作论坛等,都需要与沿线国家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感情纽带,从而促进各项倡议的顺利推进,我国应通过在受援国体育援助项目的实施,让援助成果惠于民,切实改善受援国民众参与体育锻炼的便利性,为我国实现国际战略目标架起一座“民心桥”。

#### 4.1.3 体育对外援助作为中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的“前哨站”

为全球体育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丰富全球体育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中国体育



“软实力”,是实现体育强国建设对外向度的重要目标之一。国际话语权作为衡量一国体育地位的重要标志<sup>[31]</sup>,融入现有机制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育话语体系,是国际机制与国内机制互动的两个层面<sup>[32]</sup>。就我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体系的实践而言,已基本实现由国际体育治理体系的旁观者向积极参与者的身份转变,即对现有体育治理机制的参与和融入,实现了国际机制的国内化。然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育话语体系,不仅是对现有机制的参与和融入,而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现有机制和创建符合世界体育发展潮流的体育治理机制。在欧美国家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全球体育治理体系中<sup>[33]</sup>,要实现对现有机制的改制或建立新机制存在诸多难点,体育促进发展作为全球体育治理体系的重要议程,是我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体系的切入点。所以,我国应在体育对外援助的参与实践中充分总结援助经验,创建有别于西方社会的体育对外援助机制,为国际社会提供全球体育治理公共产品,利用好体育对外援助的这一“巧实力”<sup>[34]</sup>,为我国参与全球体育治理体系提供着力点。

## 4.2 结构层面:推动体育对外援助的结构改革

改革我国当前体育对外援助的组织架构,构建合理的部门间协调联络机制,完善体育对外援助的监督与评估体系,是实现体育对外援助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 4.2.1 优化体育对外援助的部门与机构设置

部门设置是治理结构的核心,合理的部门设置是保障对外援助项目实施和过程校准的基本保障<sup>[35]</sup>。援助项目实施过程中,碎片化、分割化管理是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体育对外援助更是涉及外交、商务、教育和文化等多个机构或部门,如若仅强调援助项目实施的独立性,弱化部门间合作的相关性,将严重制约援助项目实施的有效性。

就目前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组织架构而言,相对封闭和单一的机构设置既是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取得现有成就的重要因素,也是限制我国未来在体育对外援助方面取得更大成功的主要障碍。以体育部门为主的组织架构,与我国体育对外援助的重点方向保持一致,即重视体育基础设施援助和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两个方面,弥补了西方社会对体育基础设施援助的缺憾。但是,过度倚重体育部门参与的体

育对外援助项目,限制了体育作为实现非体育领域目标的实现,特别是体育促进发展议程中所强调的体育作为实现11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

为了充分发挥对外援助作为大国外交的重要作用,国务院于2018年4月启动机构改革方案,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作为援外工作统一管理部门,整合了原商务部和外交部等部门的对外援助工作职责,统筹协调国家对外援助的总体战略谋划。体育对外援助应顺应国务院机构改革之势,在理顺原有体育对外援助机构职责的基础上,建立跨部门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实现对人、财、物的合理配置,保障体育对外援助项目的顺利推进。

### 4.2.2 完善体育对外援助的监督与评估体系

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援助有效性问题,并形成了相应的西方规范,这些国际规范也对体育援助项目实施的决策、执行和评估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中、外两种不同的援助体系中,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监督体系和评估指标,而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对外援助监督和评估体系。

就监督机制而言,应包含内、外两个层次。一方面,内部监督机制主要是建立独立于管理和执行部门的专门机构,审慎细致地对体育对外援助项目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外部监督机制主要是充分发挥学术智库、研究机构的专业特长,公正客观地对援助项目进行智力补充。

就评估体系而言,构建贯彻援助项目始终的决策、执行和效果评估相互关联的评估体系,最大限度确保援助项目发挥功效,提高体育对外援助的有效性。同时,创新援助效果评估方式方法,激发社会组织和私人机构参与体育对外援助的积极性。如建立援助项目效果评估制度,定期对社会组织或私人机构实施的援助项目方案进行评估,并依据其实施效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

### 4.2.3 构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自主知识体系

以更宏观的视野构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自主知识体系,统筹推进建立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符合国际通行规则且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自主知识体系,在与西方体育对外援助知识的对话与分享中提升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话语权。首先,对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的目标、性质、内容、原则、规律进行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结合中国对外援助的实际

情况,对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进行整体设计和统筹规划。其次,加强学术研究。在总结国内外体育对外援助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体育对外援助进行整体理论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学科理论体系。最后,加强学科建设。除了做好国内学科体系建设外,还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在国际学术平台上为中国体育对外援助知识体系搭建载体。

#### 4.3 操作层面:创新体育对外援助的方式方法

##### 4.3.1 发挥多边机构合作效应,进一步提升援助有效性

长久以来,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以双边援助为主,多边援助为辅,多边援助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随着我国从全球治理体系的边缘步入中心,作为现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应在联合国框架内不断强化与国际政府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开展国际合作。

首先,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援助项目能为我国体育对外援助项目实施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国际奥委会等国际组织一直是体育促进发展议程的重要推动力。联合国、国际奥委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长期专门从事体育促进发展的战略研究、项目设计与执行和监督评估等方面的工作,发展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机制,培养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其次,我国应在“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框架”“中非合作论坛”等重要区域合作机制中,积极利用联合国、国际奥委会等多边体育对外援助平台,增进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组织在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与协调,设置体育对外援助新议程,丰富现有体育对外援助机制。最后,借鉴其他国家体育对外援助的成功经验,不断提升援助效果。

##### 4.3.2 激发多主体各领域潜能,推动形成多元化主体格局

积极构建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引导企事业单位、鼓励体育类社会组织和动员私人机构广泛参与的多元化格局,形成“政府主导—机构参与—个人涉足”的良性合作模式,改变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参与主体相对单一,过度依赖政府力量支持,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现象。推动新时期我国体育对外援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继续发挥政府部门作为体育对外援助的引领作用,通过援建成套项目(体育场馆)和提供物资(体育器材、设备)等方式,持续提升受援国体育硬件设施条件。其次,引导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企事业单位参与体育对外援助存在天然优势。体育活动可以提升员工的协作精神,跨国企业为了营造良好的营商制度环境,有承担改善东道国社会发展状况的主动意愿。《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中国跨境企业中外方员工187.7万人,占境外企业员工总数的52.2%<sup>[36]</sup>,所以应吸纳有能力、有意愿的跨国企业参与体育对外援助工作。最后,鼓励体育类社会组织和动员私人机构积极参与。体育类社会组织具有专业性强、效率高、运作灵活等特性,在“汇聚民心、融合文化”方面具有较强的张力,是体育对外援助的重要参与体。所以应在立法、资金支持和协调机制等方面给予体育类社会组织应有的制度保障,以进一步加强和发挥其在我国体育对外援助实践中的作用。此外,体育对外援助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也有助于丰富对外援助方式的多样化。

##### 4.3.3 创新体育对外援助方法,探索构建软硬结合新形式

体育治理体系建设和体育治理能力提升是国家体育事业发展的基石。中国体育对外援助应不断提升对受援国体育事业发展的“软援助”,注重受援国的能力建设,增强受援国的自我造血能力。具体而言,充分利用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将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经验分享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为受援国培养本土体育事业人才和技术力量,提高受援国体育治理水平和自主发展能力,从而将“硬援助”与“软援助”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升发展中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巧实力”。

## 5 结语

全球发展倡议强调要努力实现不让任何一国、任何一人掉队的目标,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加速器”,将对促进全球平等和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拥有改变世界力量的体育,特别是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议程更加凸显了体育援助促进受援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未来,我国应正视挑战、抓住机遇,稳步推进全球发展

倡议中的体育对外援助体系化建设, 提升体育对外援助的影响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01).
- [2] 国家体育总局. “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EB/OL]. (2021-10-25) [2022-10-08]. <https://www.sport.gov.cn/n315/n330/c23655706/part/23656158.pdf>.
- [3] 姜咏, 俞大伟. 多元外交视域下我国体育对外援助推进策略探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22(3): 1-7.
- [4] 张贵洪. 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落实[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2-16(A01).
- [5] 钟秉枢.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下的中国体育外交战略构建[J]. 体育文化导刊, 2019(2): 15-21.
- [6] 朱传耿, 郭修金, 王凯, 等. 中国式体育现代化研究[J]. 体育学研究, 2023, 37(1): 1-14.
- [7] 张晓义, 家三爱. 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体育对外援助的目标、任务与实现策略[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0, 43(11): 9-16.
- [8] OECD.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 [EB/OL]. (2021-04-13) [2023-03-01]. <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finance-data/>.
- [9] 王涿. 国际发展援助的中国方案[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19.
- [10] 周阿堡. 萨马兰奇传[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 [11] 外交部. 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全文)[EB/OL]. (2022-11-15) [2022-11-18]. [https://www.mfa.gov.cn/web/wjw\\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211/t20221115\\_10975346.shtml](https://www.mfa.gov.cn/web/wjw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211/t20221115_10975346.shtml).
- [12] 田旭, 徐秀君. 全球公共产品赤字及中国应对实践[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1(9): 128-154.
- [13] 张梅. 从日本对非洲援助看其软实力外交[J]. 现代国际关系, 2022(4): 33-41, 59.
- [14] 李小云. 发展援助的未来: 西方模式的困境和中国的新角色[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 [15] 林毅夫, 王燕. 超越发展援助: 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M]. 宋琛,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EB/OL]. (2019-09-27) [2022-10-07]. <http://www.scio.gov.cn/ztk/dtzt/39912/41838/index.htm>.
- [17] 陈效卫. “感谢中国为我们打造‘希望之路’”(共创繁荣发展新时代)[N]. 人民日报, 2023-02-28(03).
- [18] 毛瑞鹏. 全球发展倡议及其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
- 义[J]. 国际展望, 2022, 14(6): 17-31, 149-150.
- [19] 李因才. 重塑全球发展框架的中国倡议[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9-15(A03).
- [20] 谢佳宁. “我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N]. 人民日报, 2023-02-02(03).
- [21] 邱继旺, 梁朱贵. 中国体育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实践[J]. 体育学刊, 2022, 29(6): 44-49.
- [22] 俞大伟. 中国体育对外援助主体的发展策略研究[J]. 体育文化导刊, 2016(12): 8-11, 43.
- [23] 张建会, 钟秉枢.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 经验与启示[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4(5): 55-62.
- [24] 于思远, 顾帅, 刘桂海.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体育治理的中国方案: 基于文化国际主义的视角[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1, 38(1): 39-46.
- [25] 刘官元. 中非体育互动60年历史演进与现代意义[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9, 53(7): 19-24.
- [26] 周太东. 知识合作助力“全球发展倡议”[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2-01-13(A05).
- [27] 俞大伟, 王禹莘. 中国特色体育对外援助的传承与弘扬[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20, 39(5): 132-137.
-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R/OL]. (2014-07-10) [2020-12-18]. <http://www.scio.gov.cn/zfbps/ndhf/2014/document/1375013/1375013.htm>.
- [29] 王帆, 凌胜利. 中国角色、中国方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 [30] 新华网. 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EB/OL]. (2017-05-14) [2023-03-01].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4/c_1120969677.htm).
- [31] 张伟, 张廷晓. 我国国际体育话语权的对称性实现研究[J]. 沈阳体育学院学报, 2018, 37(6): 80-84.
- [32] 苏长和. 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 一种制度的分析框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33] 刘亮, 吕万刚, 沈克印. 中国特色体育话语的生成逻辑、实践进路、解释框架与新时代的使命[J]. 体育科学, 2019, 39(9): 24-30.
- [34] 任晓, 刘慧华. 中国对外援助理论与实践[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 [35] 薛澜, 翁凌飞. 西方对外援助机构的比较与借鉴: 改革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8, 195(1): 107-113.
-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R]. 北京: 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9.

#### 作者贡献声明:

陆海林: 论文资料收集、撰写; 刘建: 论文框架设计、修改。



##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of China's Sports Foreign Assistan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LU Hailin<sup>1</sup>, LIU Jian<sup>2</sup>

(1. School of Sports Sciences and Physical Education,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60,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is a major initiative put forward by China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nging world, times and history. The overall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assistance has also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great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change of the pattern, the ratio of ideas and the change of demands have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China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sports assi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many challenges in the field of sports assistance, such as relatively weak discourse power, relatively simple participants and weak sustainability of sports assistance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study, China should take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from the aspects of clarifying strategic goals, promoting structural reform and innovating ways and methods, build a sports foreign assistance system enhance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sports foreign assistance.

**Key words:**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sports foreign assistance; sports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sports influence; sports cause

(上接第107页)

## 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ion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ZHONG Ni<sup>1</sup>, REN Junbao<sup>2</sup>, ZHANG Chunyan<sup>3</sup>, ZHONG Mingbao<sup>3</sup>

(1. Shandong Tudi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Group Co., Ltd., Financial Management Division, Jinan 250014, China; 2.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Shandong Branch, Jinan 250000, China; 3. School of P.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uidance of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reasonable growth of the economy” proposed by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is paper mainly uses literature review, logical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from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levels, taking the statistical data of the national sports industry from 2015 to 2021 as the main analysis data. The results suggest: ① The scale of the sports industry continues to expand and grow,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GDP continues to increase; ② The “quantity” contribution rate of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is high, whil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other categories is low, and it is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③ The overall productivity of the sports industry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mainly from the productivity transformation of the sports service industry; ④ The rationalization degree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low, among which the structural rationalization degree of the three categories of the sports industry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degree of the eleven categories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sports product chain is gradually reduced; ⑤ The service-orien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a high degree of optimization, while the ontological industry-oriented structure has a low degree of optimization; ⑥ The resilience of sports industry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on the rise, among which the resilience of sports industry structure is dynamically decreasing, and the resilience of sports product chain is dynamically increasing. Based on the coordination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in the sports indust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gulations that take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industry as the premise, realizing the rapid growth of “quantity”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increment as the goal at the present stage, classified development as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and innovation-driven as the driving forc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cological optimization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on of factor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increment, solving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and innovating in the whole field.

**Key words:** sports power; sports industr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mprovement in both quality and quanti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